

# 东北抗日联军

## 往事

彭施鲁 著





## 彭施鲁

彭施鲁河南省武陟县人。1916年1月出生。1934年在读高中时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35年底参加东北抗日联军，同时转入中国共产党。在抗日联军历任军部秘书，团政委，师政治部主任等职。1940年底随部队转移至苏联整训。1945年回国。解放战争期间历任东北军政大学分校副教育长，总校训练团副团长，团长，东北军区军政干校副校长。建国后任第七步校副校长，军事师范学校副校长，解放军总部军校部处长，军校部副部长，军训部副部长。解放军体育学院院长。国防科工委副参谋长等职。1961年晋升少将军衔。



1943年10月5日，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野战演习后，部分干部摄于北野营。（自左向右）

一排：巴达林 张寿鏗 王一知 周保中 金日成 什林斯基 二排：张光迪 冯仲云 王明贵 王效明 彭施鲁  
三排：杨清海 徐哲 姜信泰 金光侠 金铁宇 隋长青 四排：安吉 朴德山 崔勇进 陶雨峰 金京石



1984年5月，原东北抗日联军部分老同志参加东北抗日联军小队队工作座谈会时摄于北京。

自左向右  
前排：季青 赵树珍  
马石江 王一知 韩光  
冯文彬 冯淑艳 王效明  
彭施鲁 于保合 金厂才  
夏礼亭

中排：陈春树 孙鸣山  
张维国 黄生发 陈明  
陈忠岭 曹曙焰 李荆璞  
李忠义 李在德 金伯文

后排：吕英俊 王传圣  
姜德 沈凤山 郭喜云  
傅玺忱 常维轩 铝业芳  
苏广东 李东光 姜煥周  
刘巨海 陆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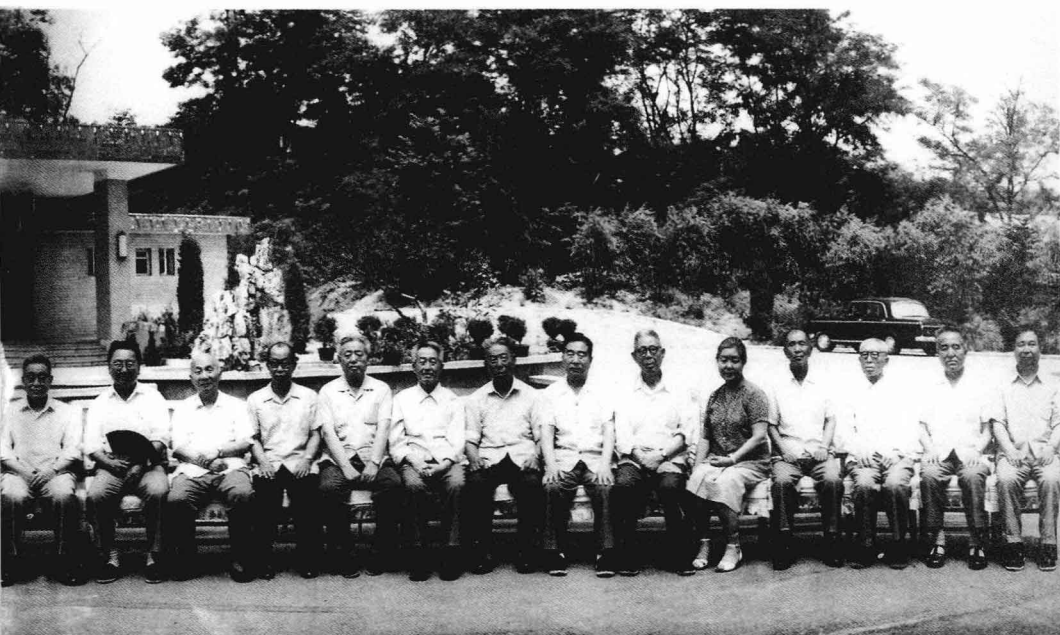


1985年7月，原东北抗日联军部分老同志参加东北抗日联军历史问题座谈会时摄于辽宁省丹东市。

左起：曲绍文 陆毅 罗定枫 王钧 黄生发 张瑞麟 王效明 李敏 王一知 彭施鲁 李范五 于林 赵毅敏 冯文彬 韩光 陈雷 李荒 马石江 钟子云 李荆璞 王明贵 赵振华 董崇彬 黎伏 李青 朱新阳 江涛 王显堂



彭施鲁(右)和韩光(中)  
共同审定由音乐家韩玉成  
编写的抗日联军歌曲集



## 目 录

- 一. 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组建始末…………… 1
- 二. 有关路线之争竞持续了半个世纪之久……………35
- 三. 和王景、金宇钟谈话要点……………55
- 四. 赵尚志的功过是非……………77
- 五. 抗日名将祁致中短暂的一生…………… 109
- 六. 赵尚志入苏久去未归之谜似已解开…………… 117
- 七. 丹东会议——为东北抗联历史上路线之争作总结  
    附：《六三指示信》……………131
- 八. 给黑龙江省委，黑龙江省政府的信…………… 161

# 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组建始末

在原苏联远东边境的伯力(哈巴罗夫斯克)附近,在1941至1945年8月将近5年的时间内,有一个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一直在紧张热烈的气氛中进行着军事和政治整训。这个旅的全体抗日联军战士在1945年8月苏军进军东北及朝鲜境内的战役中,密切配合苏联红军共同战斗,终于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这些在东北抗日战场上战斗多年的中国人和朝鲜人,没有辜负中国共产党所赋予的历史使命,于心无愧地完成了自己所肩负的重任。

## 一、我在东北抗日联军的经历

我是这个旅的成员之一。在旅内担任过连指导员、连长、营司令部参谋、旅司令部参谋等职。上尉军衔。在1945年8月即将返回东北战场之前。被苏军统帅部授予红星勋章。在1940年之前,我曾在东北抗日联军第4军和第7军工作过。我是在1935年底在北平读高中三年级时,被北平的党组织派到东北抗日联军第4军工作的。我是共青团员,那时还不满20周岁。开始时任军部秘书,

1937年时任团政委。1939年又被调到抗日联军第7军任第1师政治部主任。在这期间，参加过在1936至1937年，由第4军和第3军的联合部队在三江地区开辟新抗日游击区的军事行动，首先在松花江下游的宝清和富锦两县取得成功。打掉了许多区、镇的伪警察署、自卫队和地主武装。在1937年初，与当时抗日联军第5军和第6军取得联系之后，声势更加浩大，抗日游击区扩大到松花江下游南北两岸的绥滨、萝北以及乌苏里江岸的虎林饶河等县。在这二十多县境之内，孤立的伪警察署和自卫队纷纷投向抗日联军，地主武装也荡然无存。因此，共有抗日联军8个军的所属部队曾聚集于这一地域，人数近两万人。这一形势引起了日本人很大的惊恐，也促使他们调集了近5万人的关东军和伪军到松花江下游三江地区围剿抗日联军；同时推行归屯并户政策，将靠近山边的居民点全部焚毁，强迫居民迁至平原地区，以使抗日联军无法从农民手中取得衣食支援。加以当时抗日部队对此缺少预见和应对措施，致使在敌人大举围剿下进退失措，导致了1938年间的重大挫折。多数非共产党直接控制的部队溃散、投敌。也有少数共产党的领导干部做了逃兵。到这年年底，抗日联军的

总人数锐减至 5 千人。那年我所在的第四军为了突出重围被迫西征，而我被指定为下江留守部队负责人。在第 2 路军总指挥周保中的直接领导下，坚持与敌周旋，避免了重大损失。尔后在 1939 年初被周保中调至饶河地区任第 7 军第 1 师政治部主任。在 1939 年和 1940 年两个年头的夏秋季节，我和师长王汝起率领的部队利用宝清、富锦、同江和抚远四个县境中间广大的沼泽地区为依托展开游击活动。既可以利用其天然的隐蔽条件得到充分的休整，又可出其不意地出击。在那两年当中我们曾多次袭击伪警察所和分散孤立的伪军据点、或者是日本人的开拓团。但一到冬季，我们就处于完全被动地位，在得不到粮食供应而又长期被日本军袭击下，伤亡增多。叛逃者也时有发生。终于在 1940 年底有组织的撤退至苏联境内，转入休整期。

我们自己想象中，是利用冬季在苏联境内为期三、四个月的军事和政治学习，而到春季冰雪融化时立即返回东北境内重新投入抗日游击斗争。但我们并不理解，苏联人为了自己的安全，不会这样做的。它会引起和日本人之间的纠纷。

这次进入苏联境内，照例被苏联边防军解除了武装，



尔后在边防军哨所的院中接受盘查。但所有人员都没有被看管。只被告知不要走出院墙。他们给了面包，还给牛肉和土豆要我们自己做饭吃。直到夜晚，才来了几辆大卡车。车辆是用大块帆布严密封闭的。利用夜晚将我们全部送至伯力市。在那里由苏军内务部接待了我们。休息、吃饭、洗澡，换下了早已破烂，长满了虱子的衣服，尔后又被送至距伯力市 75 公里处位于黑龙江岸边的一个营地。当我们下车后，突然发现在那里欢迎我们的都是抗日联军的战友，有的还是老相识。大家高兴地相互握手拥抱。尔后被安置在一个个帐篷内。每个帐篷只能住十人。靠大火炉取暖。这里后来成为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的营地。它隐蔽在一片森林中，紧靠在黑龙江边。因为附近有一个小村庄叫弗亚斯克。苏联人称之为弗亚斯克野营。而我们称之为北野营。因为在海参崴附近的蛤蟆塘还有一个同样性质的野营，那里住着第 5 军和第 1 路军的许多抗联战士。我们称之为南野营。

## 二、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是由此开始的

我们来到野营后，第二天就参加了军事训练。首先是队列训练，立正、稍息、原地转法、走步等。还有就是射

击、刺杀、单兵战术、政治课等。大家学习热情很高。当时野营只有三名苏联军官，由他们担任教官。

到了三月下旬，有两批人已经返回东北重新投入抗日斗争，另外几批人也整装待发。但就在这时，苏联人发出了暂停的口令。由于在四月中旬苏联和日本签署了苏日中立协定，苏联人为了避免惹起两国之间的纠纷，告知了我们已不能再协助抗日联军部队返回东北境内。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我们只好决定在苏联境内长期整训，并等待时机再返战场。

这时，东北抗日联军的总人数只有近700人了。除此之外，还有一批人被控制在苏军的情报部门。他们经常地直接由苏军派回东北境内进行武装侦察工作。多由三、五人组成的小分队化装为日本军人，定点地对日本人的军事设施进行短期的侦察活动。这些人完全生活在封闭状态，因之人数无法查清。但他们都是原东北抗日联军优秀的干部和战士，直到抗日战争胜利结束之后，才陆续回国。

### 三、东北抗日联军和苏联远东军的关系

说到这里，我想有必要就东北抗日联军和苏联远东军之间的相互关系，略加叙述。

在 1938 年之前，东北抗日联军或者是东北的中国共产党各省委，都未能和苏联远东军或远东地区的苏联共产党建立起联系。这个现象似乎有些不太正常。因为很多队伍活动在中苏边境地区。如松花江北岸的萝北、绥滨县，松花江南岸的富锦，同江县，乌苏里江西岸的饶河、虎林、密山、抚远等县，在东满的汪清、珲春县等。在莫斯科还有中共中央的代表团存在，它在 1933 年至 1937 年之间一直对东北各省和抗日联军的几个主要领导人存在着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但这些都未能帮助东北抗日联军从苏联远东军取得任何帮助。据我所知，有少数抗日联军领导人，如第 7 军的军长景乐亭、参谋长崔石泉（崔庸健），第 6 军师长陈绍滨等，曾多次穿越国境线，并在苏联边境住留若干天之后，又返回部队。但这些只能是他们个人与苏联边防军之间的交换情报关系。对部队无所补益。

到了 1938 年春，日本军开始了对东北抗日联军的大规模围剿，并使我们遭受了重大挫折之时，有些领导人才开始谋求苏联人的援助。那时驻莫斯科的中共代表团已经回国。对东北抗日联军实际上采取了撒手不管的态度。这时，北满省委决定派第 3 军军长赵尚志去苏联寻求援助。

赵尚志曾是大革命时期黄埔军校的学生。而现时的苏联远东军区司令员布留赫尔元帅曾在那时的黄埔军校授过课。是孙中山请来的军事顾问，当时称之为加伦将军。赵尚志想借过去的师生关系取得认可，就写了一封信给布留赫尔元帅来推荐自己。但不幸的是，在1938年的春天，这位元帅正在接受一场肃反运动的审查，他被怀疑为日本奸细，以后因此而被处死。赵尚志当时不仅未受到朋友式的接待，还因此而被长期关押受审，直到1939年才被释放回国。

和赵尚志相似的，还有抗日联军第6军军长戴鸿滨和第11军军长祁致中。戴鸿滨是在赵尚志越境几天之后，因与日本军作战失利而被迫率500名抗联战士越境。部队被苏军缴械，绝大部分人被遣返新疆。祁致中是想建兵工厂，想从苏联要些军工设备。他们俩人都被苏军扣留，并和赵尚志关在同一个狱室。

冯仲云是比较幸运的，他在1939年的9月以中共北满省委常委的身份，在下江特委书记高禹民的带领下进入苏联境内。也许是苏联人此时已经从赵尚志、戴鸿滨和祁致中等人审问中得知抗日联军的许多情况，由此而确信有

个北满省委在领导着这个武装队伍，而且冯仲云是个重要领导人。他们有礼貌地接待了冯仲云。当时冯仲云还不知道赵尚志已在此前的六月间率领戴鸿滨、祁致中还有一百来名战士返回东北。因此他向苏联人提出三点要求：一是将赵尚志释放回国，二是请苏联人向抗日部队提供武器援助，三是请苏联人帮助打通和延安之间的联系。对此苏联人答复说：赵尚志已经率队回国；打通和延安之间的联系问题他们可以报告莫斯科；至于提供援助问题，他们说事实上已在执行，因为赵尚志率队回国时所携带的步兵武器全都是日本的最新武器，今后会继续这样做。除此之外，苏联人还向冯仲云提出建议，说抗日联军应该有一个统一领导机构。冯仲云认为这个建议很好，但这样的问题须由东北的吉东省委和北满省委共同商议才能做出决定。目前的情况是，我们和吉东省委的负责人周保中很难联系上。如果苏联人有办法找到周保中，很愿意在苏联境内和他会见，共商大计。在这一情况下，周保中直到11月才到达伯力。接着在12月间，赵尚志因部队在战斗中屡次受挫，重新返回伯力。这就形成了周保中、冯仲云和赵尚志之间的三人会谈。他们把此称之为吉东、北满两省委联系会议。

东北的党史工作者称此为第一次伯力会议。会议除了讨论如何在极为严峻形势下坚持抗日游击战争的方针之外，还在如何争取苏军援助方面取得共识。即在未取得中共中央联系时，应该能得到苏共边疆党组织的指导和支持。这些都得到了苏方的认可。同时由苏方指定一位苏军少将王新林和一名校官海洛为固定联系人。从此，才开始了东北抗日联军和苏联远东军之间的工作关系。稍有遗憾的是，由于第一路军总司令杨靖宇一直战斗在南满地区，距中苏边境较远，一直未能和苏联人取得联系。

#### 四、1940 年底的第二次伯力会议

尽管在 1938 年之内东北抗日联军遭受过重大挫折，东北的抗日游击斗争在 1939 至 1940 年的两个夏秋季节里，依然是活跃的。在小兴安岭西麓，第三路军曾成功地袭击过克山、讷河、肇庆等县城；在松花江南岸的三江地区，第二路军曾成功策反过驻宝清县伪军 30 团的机关枪连的起义，袭击过富锦县柳大林子镇和密山县的日本开拓团，都夺取了相当数量的武器、弹药和粮食，使日本关东军颇为震惊。但一到冬天，我们却完全处于被动挨打地位，人员伤亡较大。如果能在冬季在苏联境内休整，而一到春

季来临时重返战场，是最理想的方案。但苏联人没有明确同意这样的方案。因为这极有可能增加苏日之间的纠纷。

到了1940年10月，苏联远东军用王新林的名义发出电报，要求抗日联军的军以上领导人到伯力市开会，并说届时将有中共中央代表莅临。因此，在11月至12月期间，周保中、李兆麟、冯仲云、金策、崔石泉（崔庸健）、柴世荣、季青、王效明、金日成、安吉、徐哲等陆续在部队的护送下分别从萝北、饶河、瑯春等边境地带来到了伯力市。这时在东北境内依然保留了为数不多的游击队伍。

在1941年1月，王新林告知周保中和李兆麟准备开会。当时大家都以焦急的心情等待和中共中央的代表见面，但王新林却闭口不谈此事。在一再追问下，王新林解释说，实际上并没有中共中央代表要来。但是我们确有必要请大家来共商东北抗日联军今后行动大计，无法用远东军的名义召开这样的会议。请大家谅解。周保中在表示遗憾之后又问，既然是这样，那会议又怎样开法？王新林答曰：由我参加和大家共商大计。周保中说：这不合适，如果有中共中央代表到会，理应由他主持这样的会议。现在是并没有中央代表到会，这样的会只能是抗日联军各部领

领导人自己人共同商讨的会议。在这样的阶段如果王新林参加进来，肯定大家是不会畅所欲言的。应该是在开始阶段先开抗日联军领导人的内部会议，尔后再综合大家的意见，并和苏方共同商讨决定。紧接着，为郑重起见，周保中和李兆麟共同签署了一封给王新林的信，以书面形式表达与上述相同的意见。王新林原想由他来主持控制会议而遇到了拒绝。引起了王新林极大的不满，此会议无法马上召开。

当时还有一个矛盾。王新林原来的通知中还有赵尚志也应参与会议。但当时李兆麟和周保中都拒绝他与会，也引起了王新林的不悦。李兆麟和周保中不得不反复向王新林说明自己的理由。他们说在1940年初赵尚志已被北满省委开除党籍，并拒绝他在第三路军内任职。理由是他在1939年6月返回东北期间一再散布说李兆麟、冯仲云和周保中、金策等人是日本人的奸细，说现在抗日联军执行的是奸细路线；并多次宣布他返回东北的任务之一，就是肃清奸细路线。因此，北满省委怀疑赵尚志可能以奸细罪名谋杀他们。并依此做出决定开除赵尚志的党籍。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周保中为了给赵尚志以改正错误机会，在



1941年春接受赵尚志为第二路军副总指挥。但在这期间，赵尚志又多次向第二路军的一些人散布不满情绪，说李兆麟、周保中等有奸细嫌疑。周保中对此非常惊讶，并不再视赵尚志为自己可以与之共事的人。这样赵尚志在抗日联军内已没有任何职务了。

因为上述的一些问题，使会议未能及时召开。但就在这个期间，王新林采取了另外的途径，以求实现自己的主张。他个别地找这些抗联领导人交谈，宣传他的主张，争取他们的支持。同时，周保中在和自己的战友们接触中，得知王新林在讲些什么。他们说王新林想找一位苏联将军担任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还说东北抗日联军应该和吉东、北满省委脱离关系，也就是说不要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周保中听到这些意见后，显然有些不满。他回想起自己从1928年底到1931年秋在莫斯科学习期间的遭遇。那时他被党中央派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正赶上当时的校长米夫拉拢王明等人掌握了学校支部局的大权，大搞宗派斗争，反对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1929年清党运动中，许多中国共产党员被怀疑为托洛斯